

晚清的内忧外患与日本近代化

罗立东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晚清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屡次侵略而渐次沉沦,内部又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可谓内忧外患。这向尚处锁国状态的近邻日本频频发出强烈警报,使其获得改弦更张、积极面对列强来袭的启示,并断然走上开国、倒幕、维新的近代化之路。

关键词:日本近代化;晚清;内忧外患;开国;明治维新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3-0183-06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并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告终,此后西方列强纷纷侵入中国,丧权辱国的条约接踵而来。这不仅是中国旷古未见之奇变,而且也向尚处锁国状态的日本频频发出强烈警报,使其获得改弦更张、积极面对列强来袭的启示。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引起19世纪日本第一次研究中国的热潮,那么太平天国与清王朝长达十余年的战争和二次鸦片战争也同样为日本所关注,并由此导出新一轮的中国研讨,各阶层人士从中得到深刻的教训和启示。日本与曾是其“文化母国”的近邻中国同样面临因西方列强入侵而半殖民地化的威胁,“中国作为在远东的传统超级大国所遭受的失败和耻辱,不可避免地对它南方和东方的较小亚洲国家产生相应的后果”^{[1]964}。因此晚清社会就成为幕末——明治初期欲求开国、维新的日本士人力加观照的重要方面,促使了日本民族从闭关自守的迷梦中迅速觉醒。这与日本的求新知于西方的努力相呼应,共同构成其开国全局^[2]。恰如日本著名学者佐藤诚三郎所言:“西方列强的开国要求被中国拒绝,从而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西方的冲击就以这种预告的方式传到了日本。这样,虽怀有十分强烈的危机感,但又未被压倒而处于绝望状态,这种连续不断的刺激,是促进后进国努力实现近代化的最适当的环境。”^[3]日本从此开始了开国、倒幕、维新,迈向近代化之路。

一、日本各阶层人士对中国事变的关注和反应

日本一向以中国为师,对中国怀有深厚的、尊敬友爱的感情。日本的儒学者也非常崇拜中国,推称她为“理想的国土”、“圣贤的国土”、“中华的国土”,在日本人眼里历来是十分崇拜的理想强盛之国,感到它是不易战胜的文明礼仪之邦。然而,堂堂的“天朝上国”居然不堪一击,竟然被一个远隔重洋、曾被视为“夷狄小邦”的英国打败,这就向沉湎于锁国睡梦中的日本敲响了警钟,引起了日本社会各阶级的震惊,并带来紧迫的危机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日本有识之士的觉醒。

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入日本之后立即出现了不少描述鸦片战争的作品,其反应之快,令人吃惊。如《鸦片始末》、《阿片乱记》、《阿芙蓉汇闻》、《清英战记》、《海外新话》、《清英近世谈》等。由中英就输入鸦片问题由交涉直至开战的各种消息编辑成册的《鸦片风说书》被大量翻刻,广为流传。记载英军侵华暴行的《夷匪犯境录》最初以手抄本形式传入日本,流传甚广。另外还有从中国传入的《侵犯事略》、《乍浦集咏》以及其他收录鸦片战争的日本书籍《阿片类集》、《清兰阿片单报》、《唐风说书集》等。这些书籍的传播使日本上至幕府官员、大名诸侯、各级武士,下至普通民众,广泛了解了中国发生的

* 收稿日期:2006-12-06

作者简介:罗立东(1970-),男,湖北枣阳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近现代国际关系。

鸦片战争。甚至到鸦片战争后十余年,日本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通俗小说,如《海外新话》、《海外余话》、《清英近世谈》及《海外新话拾遗》等。这些作品大多是在战后几年之内出版的,这个事实本身既反映了日本人对中国鸦片战争之关心重视和反应之快,也说明了鸦片战争给予日本多么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中国发生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在日本也引起了巨大反响。1854年在日本社会上流传着诸如《云南新话》(又名《唐土炭屋记》)、《清明军谈》、《外邦太平记》、《新说明清合战记》等有关太平天国的小说,还有写作年代不详的《鞞鞞胜败记》、《小刀会故事·满清记事》等。仅仅在太平天国攻占南京以后一年之内,日本就出现了这么多种描写太平军的小说,其出现之快、出版之多,非常出人意料。这充分反映出日本各界人士对太平天国的关注和兴趣。这些小说的作者凭借有限的传闻,加以丰富想象来描写自己心目中的太平天国革命。其离奇的情节当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而编造,它包含了编者出于本国安危的考虑,希望中国出现一个类似明王朝的新兴政权,取代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以抵御西方殖民者侵略的由衷希望^{[4]275}。

二、中国事变对日本统治阶级的影响

鸦片战争的消息传来之后,幕府深感震撼。1841年正月总理政务的首席老中(幕府中的最高政务官员)水野忠邦在给其心腹佐渡奉行川路圣谟的信中谈及新近在清国发生的事变:“此次来舶人称:清国严禁鸦片通商不当,引起英国人不满,派军舰40余艘到宁波府发动战争,现已占领宁波县之一部。此虽他国之事,但亦应为我国之戒也。”^[5]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原来以为“清国无论如何乃一重要之大国,夷狄不敢轻易问津”。当他听到鸦片战争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他说:“最近谣传清国战争,人心浮动,如果确有其事,则任何事情,均可置诸不问,唯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备耳。鉴于清国战争情况,急应公布天下,推延日光参拜,以日光参拜经费为武备之用。”^[6]日向国佐士岛津忠宽在向幕府上书时,也忧心忡忡地说道:“今清国大乱,难保何时波及日本。”^{[7]83}从此,德川幕府对中国的崇拜崩溃了,转而开始恐惧于西方强国的武力,对外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被迫对厉行长达两百多年之久的锁国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显示出对外开放的端倪。对日本近代化的启动而言,是一个积极的结果。这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对幕府的最初影响。

1842年8月,幕府为了避免引起与外国的冲突,废除1825年发布的《外国船驱逐令》,而代之以《薪水给予令》,改变以往那种不加区别地开炮乱轰、一律予以驱逐的生硬做法,而允许对缺乏粮食、燃料和淡水的外国船只在指定港口加煤和购买食物和对遇难外国船只给予救助,并劝谕其离开日本。1853年夏幕府默默地听任美国敲开日本的大门,老老实实地在日后的《日美亲善条约》上签字,没有进行民族战争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抵抗,从此日本被打开了紧锁的国门,结束了两个多世纪闭关自守的局面。1858年美、荷、俄、英、法与日本签订了《安政五国条约》。“这件事只使用了武力威胁而没有进行真正的战争就完成了。这主要是由于日本人知道西方的船舰和大炮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命运。……到1858年,幕府政府已经深信,闭关(锁国)政策必须作彻底的修改,而关于中国遭遇的消息只是更加坚定了他们的这一观点:日本必须不加抵抗地接受正在强暴地施加于中国的新政策。……对外国的要求采取明显的完全屈服的 policy,由此引起的不满威胁着它的统治,冒犯西方列强又可能与中国一样招致无法招架的猛烈的压迫。”^{[1]966}老中堀田正睦表示,“如果我们不警惕,万一炮声一响,就不易挽回了”^{[8]124}。“担任谈判代表的幕府官吏们,了解清朝在鸦片战争和亚罗号船事件中战败的情况,深恐日本重蹈清朝的覆辙。”^[9]连荷兰人也用中英鸦片战争来警告日本。1844年荷兰海军上校科普斯率军舰帕兰邦号驶入长崎港。他带来了荷兰国王威廉二世的亲笔信,提醒日本注意“近来英国国王向中华帝国出兵而发生激战的情况”,并警告日本如拘泥于锁国之旧习,必将重蹈中国的覆辙,“贵国今亦将罹患此种灾害”^{[10]188}。

开国以后,幕府很关心中国国内战争情况和清政权的安危,对太平天国表现出极大的不安,甚至忧虑中国革命波及日本,曾多次下令探听、收集有关太平天国的情报。日本幕府还通过日本的漂流民和朝鲜以及向荷兰商船了解中国的情况,甚至向美国、英国、俄国军舰探听。同时,幕府逐渐把对外贸易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来考量,先后共4次向中国直接派出贸易使节团。日本使节团格外注意于列强在华情状,以及中国官民对此的反应,这对日本近代化的启动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1862年幕府第一次派遣使节团乘坐贸易船“千岁丸”访问上海,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的社情、风俗、典章制度、市场商情及日中贸易、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形势、西方列强入侵状况及中国政府与民间的

反应作了具体考察,可以视作近代日本直接观察晚清社会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开端。当时上海是中国第一批对西方列强开放的门户,透过这个颇富国际色彩的窗口,可以窥见西方文明的端倪,并获得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经验。当时清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事则在长江流域继续激烈展开,正值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上海正处在清军与太平军作战的前线,对于急欲了解这场战事的日本人而言是一个近距离观察点^[1]。通过观察,他们得出的总体印象是广土众民、文化传统悠久的清国确乎已经国势衰微、民气低迷。而这个泱泱大国之所以褪尽昔日辉煌,败落如此,以至被西方列强凌辱、宰割,皆导因于闭关锁国、民风闭塞、政治腐败。这种观察在日本人中引出的结论,均对此后日本的走向发生重大影响。这些来华的日本藩士从清朝制度中看到的是衰颓老迈,无力应对事变,洞悉到科举、八股毒害中国士人的制度性病根。曾是日本“文化母国”的近邻中国的沉沦,给日本人敲响了警钟,他们获得的共识是——不能重蹈中国之覆辙,必须改弦更张。维新志士高杉晋作在其所撰《内情探索录》中沉痛指出:“支那人为外界人所弃役,可怜,我邦遂不得不如此,务防是祈。”藩士们奋笔记录目睹身受,留下数量浩繁的纪行文字,活现出同治初年华洋杂处的上海的历史场面,并展示了日本幕末志士“以清为鉴”,寻求开国、维新之路的心迹。通过这次上海之行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西方势力在中国的猖獗和太平天国革命的亲身感触,成为他们的思想从尊王攘夷发展到倒幕维新的重要因素。这恐怕是幕府没有想到的。^[2]同样,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也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幕府于1866年4月终于解除禁令,派大量的留学生前往西方各国学习和经商。这就为后来的倒幕开国、明治维新而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之路贮备了必要的人才。

三、中国事变对日本知识分子的巨大启示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受的惨败给日本知识分子的打击和震撼尤甚。幕末日本下级武士从统治阶级行列中被抛出来,变成自食其力的教师、医生、艺人、手工业者、小商人等。这些下级武士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知识分子,形成了日本有识之士阶层。这些人有的充任幕府的下级官吏,有的被称作“草莽英雄”。他们的活动和思想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资产阶级的观点和利益。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对幕府推崇的儒学思想(主要是朱子学)提出了疑问。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深,他们的性格、教养

和知识条件促使他们首先登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在资产阶级还没成熟、农民阶级也没有能力的条件下,历史的巨变决定着这个阶级抢在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前面,顺应历史潮流来代表日本民族的利益,充当了日本近代化启动、发展特别是倒幕维新的领导者。晚清对日本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影响了这些人,如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横井小楠等。他们最初大都是儒学者,汉学修养很深,有的人对洋学全然不知,其思想发生变化,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此他们逐渐从儒家思想的束缚和华夷观念中解放出来,开始了解和研究西方,最终走向开国维新的道路。佐久间象山曾经这样质问国内拒绝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保守派:“西洋各国精研学术,国力强盛,就是周公孔子之国,都被它们掠夺,你想这是什么缘故?”^{[8]218}

鸦片战争使日本知识分子进一步认识到中日两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由于日本即将到来危险,更使他们为本国前途满怀忧虑。幕府最高学府昌平馆舍长斋藤竹堂得知鸦片战争猝发、“英夷寇清”的消息后,慨然命笔,在《鸦片始末》卷首作诗云:“海外之洲迹渺茫,忽闻西虏势腾骧。蛾眉解作三军师,鸟嘴利于千段枪。铁舰胶沙推不动,绒旗委地暗无光。休言胜败属秦越,自古边筹戒履霜。”^{[7]84-85}诗中“履霜”一词出自《易经·坤卦》之“履霜坚冰至”句。“戒履霜”意即列强侵略中国乃是入侵日本的先兆,要严加防范,万不可掉以轻心。有的记载鸦片战争的书籍,如狩野深藏著作就直接命名为《履霜录》,他还大声疾呼:“易曰履霜坚冰至,今则已履霜矣!”岩谷宕阴在《阿芙蓉汇闻序》中也指出:“今观满清鸦片之祸,其由不戒于履霜矣!”还说:“西海之烟氛,又庸知不其为东海之霜也哉。”^{[12]19}又如山田芳谷在奉命巡视山阳一带海防时,赋诗警告说:“勿恃内洋多礁沙,支那倾覆是前车。浙江一带唯流水,巨舰沂来欧罗巴。”诗中明确指出日本不能对英国等欧洲列强侵华一事抱以隔岸观火的漠然态度,日本政府不要单纯依仗海疆天险,从中国浙江到日本的海路相通,欧洲的炮舰一下子就能到达日本,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日本必须以清朝政府的战败为鉴,加强戒备,以待不测。这充分反映了日本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危机感^{[4]273}。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威胁面前,一些曾对中国存有非分之想的日本知识分子也开始转变态度。鸦片战争后列强虎视日本的冷酷现实使佐藤信渊的思想为之一变,他于

1849年为答复原伊势津城主的咨询而撰写成《存华挫狄论》。与20多年前充溢着昧于世界大势的封建扩张狂想的《宇内混同秘策》大相径庭的是,佐藤信渊站在东亚被压迫民族立场上,显示出对西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放弃了入侵中国的主张,转而力主“存中华,挫夷狄”。《存华挫狄论》在记述鸦片战争经过后,于卷末寄望中国振起,成为日本的“西部屏障”,并热切希望中国,“君臣苦心焦思,赈贫吊死,上下同劳苦,调练兵将。数年后乃起复仇义兵,征伐英夷,将其彻底逐出东洋,使中国永为日本之西部屏障”^{[4]274}。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然后又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强烈地刺激了要求变革的维新志士们。维新志士对幕府统治强烈不满,要求改革内政、抵御外敌,并希望天皇掌权,大政复古。他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结合日本社会的现实,分析研究中国爆发太平天国革命的教训,得出日本必须加紧实现变革维新的结论。他们对太平天国的了解和认识推动了日本的倒幕开国、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展。他们担心中国的“内乱”会波及日本,转变成本国的“外祸”和“内乱”。早在1853年6月2日萨州藩医汤藤龙栋在一封信上就指出:从中国兵乱的情况可以看出,已经到了整个世界都发生兵乱斗争的时代了。因此他预言“日本在十年之内也将发生战争”。他们叹息清政府的处境“外有洋夷猖獗,内有贼匪煽乱”,感到“近在一水之外,真是十分令人担忧的”。由此得出外患引起内乱,而内乱又加深外患的结论。因此对于处在西方侵略势力冲击下的日本也可能发生大规模人民革命的前景非常不安和恐惧^[13]。

19世纪60年代,日本政局瞬息万变。以下级武士为核心的倒幕势力几经反复,从尊王攘夷派转变为武力倒幕派。在他们的领导下,终于推翻统治日本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封建幕府,建立了明治新政府。在这个决定性的政局大转变中,倒幕派的形成具有关键意义。倒幕派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即来自中国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是他们的思想从尊王攘夷发展到倒幕维新的重要触媒,是促使尊攘派走上武力倒幕道路的原因之一。

四、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出路的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对鸦片战争的反应也同样为日本所关注。鸦片战争的失败惊破了统治集团中部分人的迷梦,

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一些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朦胧地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古老中国封建主义面前所表现出的某些优越性,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的刺激下放眼世界,展开了对整个世界的研究;通过研究外国史地、了解国际形势以寻找救国的道路和抵御外敌的方法。这些御侮图强思想传到了日本,并在日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日本学者比较注意了解和搜集中国学者有关西方认识的论著。日本先进思想家不仅积极向中国学者学习,还提出了超越他们的主张。这些变革和学习西方的主张还为幕府中开明的大官僚和一些藩的大名部分地接受,并付诸实施。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日本近代化的启动。可以说,中国先进人士对鸦片战争的认识和寻找自强出路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对日本的知识分子起着路标的作用。

例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加强海防、抵御外敌的建议。第一卷《筹海篇》即含有战略战术意义的论述海防之策,故最初该书在日本被翻刻的主要是这一部分,随后其他的地理地志部分才陆续经数人分别按洲别或国别训点翻刻。这对于幕末面临西方列强侵略威胁的日本人,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可以说,它影响了日本幕末的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给予那些要求抵御外敌、革新内政的维新志士以启迪,为其了解世界,变法维新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粮,促进了整个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推动了日本的开国与维新。“唱开化日新之说”的先觉者佐久间象山读后颇有共鸣,于1854年5月描述自己阅读《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的感受时说:“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他也批评魏源的某些观点:“魏云,自上世以来,中国有海防,而无海战,遂以坚壁清野,杜绝岸奸,为海防家法。予则欲盛讲炮之术,而为邀击之计,驱逐防截,以制贼死命于外海,是为异耳。”“海防之要,在炮最具首。魏氏海国图识中,辑铳炮之说,类皆粗漏无稽,如儿童戏嬉之为。凡事不自为之,而得其要领者无之。以魏之才识,而是之不察,当今之世,身无炮学,贻此谬妄,反误后生,吾为魏深惜之。”^{[12]27}

五、日本人士对清末内忧外患的总结

鸦片战争这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冲击,其余波又通过中国的失败辗转到了日本,使经济上尚未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日本,首先在思

想上受到了冲击,这为日本迅速认识世界资本主义和日后开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准备了思想条件。而日本晚于中国十几年才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从而使它以中国为参照,获得了一个思考命运的机会。日本人士力图通过对晚清的研究,以中国为借鉴,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进一步分析、总结中国的经验,吸取其教训,结合日本的现状,纷纷提出了打开国门、学习西方、加强海防、改革内政、乃至维新变法等振兴民族的建议和主张。

幕末维新志士通过总结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认为中国对外战争失败和发生农民革命,主要是由于清政府政治腐败、武备不修,对外屈膝投降、鱼肉人民、实行暴政,武器和军事技术落后。并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闭目塞听,既不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又不了解世界形势,甚至仍然把西方各国当作昔日的夷狄加以轻视,结果遭到惨败。1844年6月斋藤正谦在谈到中国战败原因时说:“清国自称华夏,把外国视为禽兽,然而这些国家机智敏捷,机器出色,清国却没有任何防备。外国乘船海上纵横,清国反受它国凌辱。”盐谷宕阴在《阿芙蓉汇闻》中也强调:“英知清,清不知英,清以华自夸,英以见夷而怒。怒则备,夸则忽,未战而胜负见矣。”^[6]日本学者批评中国儒学只讲究钻牛角尖的烦琐考据,作空洞无物的八股文,脱离实际,不能为反侵略斗争服务。“现在清朝的衰弱是因暴政所致,如果一旦改为仁政,施于四海,就能调动兵革,扫平贼匪,易如反掌。”中国衰乱的原因在于内政:“中国全国不正之风习使毛贼不能平定。听说奸臣受毛贼赠礼,不愿出阵,迟迟出征,军需品缺乏,怎么能不失败!”他们还忧虑太平天国革命的成败会加深日本的外患和海防危机。岩谷宕阴在《防春或间》中还说:“如果清亡之后,英夷定分兵江南,宁波、乍浦被英夷所占,必成大患”。岛津淡路也大声疾呼:“近来清国之乱何时波及日本,沿海地方应随时注意。”吉田松阴在《清国咸丰乱记》的例言中指出:“中国的治乱往往和我国的关系至大,决非离我遥远的欧美诸夷可比。”因此,他认为可称之为“中国一大变乱”的太平天国革命对日本也有重大影响。他列举历史上的例子:“过去天平宝字时,唐代安禄山谋叛,天朝就命筑紫,加强戒备,可见古代朝廷的用心,现在也应当如此。”他主张应以中国的变乱为殷鉴,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中吸取教训,采取措施,防止内忧外患相结合,避免重蹈清政府的覆辙。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认为日本为了避免发生像太平天国那样的全国性

大规模人民革命和防御西方侵略,必须赶紧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废除幕府弊政,实行维新,才能控制住人民并加强抵御外敌的力量。这种认识推动了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展。因此,不仅幕府主动进行了改革,而且日本地方各藩,特别是萨长等强藩,也纷纷进行藩政改革,制造西式船炮,训练西学人才和新式军队。日本的武士们还从鸦片战争中借鉴战略战术,了解英国的侵略伎俩^[13]。这一切都为日本从开国走向明治维新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日本有识之士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前车之鉴,深感盲目排外之无益,从而趋向于开国,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民族危亡。著名学者加藤弘之在其所著《邻草》中批评道:“如自二十年前之鸦片乱后,即采用此良策,当不致陷入于如今之危局。彼毫无兴革衰政之志向,而唯行偷安之策,实深可叹也。”^[10]¹⁷⁷佐久间象山在读《鸦片始末》后不胜感慨道:“当今天下之可畏者,莫大于外寇,而戒备之要,莫先于知彼。苟能知彼,则我之所备之者,自不能已矣。而世人愤愤,鲜克知之者。独子德(斋藤馨之号)于此勤勤者是始末,以为知彼之资。其识之远,非特能文之士也。三复之余,敬叹不足,乃书其后。”从此他开始学习兰学^[12]²⁴,并且提出首先要加强对西方的了解以御敌。日本学者把鸦片战争中失败的中国与西方加以比较,引为前车之鉴。他们感叹道:“近代以来,物理工夫之精密,不得不推泰西人为绝妙,大见巨炮,神速如风霆,足以知意匠之精妙”,而腐朽的清王朝“殉俗泥古,慢自尊大,曾无取长补短之心,是以一旦与之角,望风骇走,不得一措手”^[14]。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统治者妄自尊大,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不能及时接受新鲜事物,才在鸦片战争中遭受到惨败的下场。岭田枫江在《海外新话》的叙诗云:“巨炮震天坚城摧,夷船进港汉军走。……哀哉百万讲和金,往买夷酋一朝暎。”在诗的最后点明了写作此书的目的:“天赐前鉴非无意,婆心记事亦微衷。呜呼!海国要务在知彼,预备严整恃有待。”^[6]

日本十分注意汲取清王朝在与西方交涉中失败的经验教训,为以后日本处理对外关系和开国问题提供了借鉴。他们一方面逐步接受开国要求,及时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又可以加紧改革和充实国防,以避免毁灭性的打击。这样,即使日本也是在西方武力胁迫下被动开国的,但却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破坏,更没有遭到割地、赔款的厄运,从而顺利地摆脱了半殖民地危机,为明治维新的历

史性选择与变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5]。在倒幕活动中,倒幕派领袖们力主议和,也努力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例如,倒幕派接受了英国的援助,但却没有从英国那里接受像幕府从法国那里接受的以提供权利作为交换条件的军事、财政援助。1867年夏,英国公使馆员佐藤爱之助向西乡隆盛说,为了对抗法国援助幕府,英国可以援助他们。对此西乡隆盛断然拒绝说:“关于变革日本政体问题,应由我辈尽力而为,如与外人相商,则有失体面。”这是日本人在上海目睹清朝请求英国镇压太平天国后,引以为戒的精神在实践上的发展^[16]。当时日本宫廷对与外国使节关系上所取的态度,大抵是以几位高级官吏所上的一件奏折为依据,在那件奏折中,日本的统治者们想到了中国的命运:“欲重振帝国的衰运,使万国共仰皇帝的威仪,则必须痛下决心,廓清历来偏狭之见。……放弃历来称外国为犬羊夷狄的愚论;改良以往取法于中国的朝仪;依据万国通例所规定的仪节,召见各国代表”^[17]。

在西方列强侵略的威胁之下,日本以强为师,积极学习西方文化,逐渐走上近代化之路。但日本毕竟是一个亚洲国家,在历史文化的传统上和中国的关系极其密切。开国前后,又随着亚洲形势的变化,并且吸收了等亚洲国家的经验教训,才断然走上倒幕维新的道路。日本史学家中山久四郎曾正确指出:“自古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多么久远的影响,今天不必细说。即使就近代日本的历史而言,近代中国的势力或事件也是不断引起日本激动的重要因素。无视这种势力或事件,就不可能考察和理解近代的日本历史。”^[18]日本近代著名教育家小林虎三郎也曾说过:“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反而改焉。则清国亦为师夫焉”^[19]。这也许能够给今天的中国很多启示。

参考文献:

- [1] (英)伯理.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四卷·欧洲势力的顶峰 1830—1870年[M].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2] 冯天瑜. 日本幕府使团所见 1862年之上海[J]. 近代史研究,1999(3):183—212.
- [3] 沈仁安,宋成有. 日本史学新流派析[J]. 历史研究,1983(1):127—151.
- [4] 沈仁安. 日本史研究序说[M]. 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 [5] (日)加藤祐三. 黑船前后の世界[M]. 东京:岩波书店,1985:283.
- [6] 王晓秋. 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影响[J]. 世界历史,1990(5):92—100.
- [7] 王晓秋.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 [8] (日)井上清. 日本现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M]. 吕明译. 北京:三联书店,1956.
- [9] (日)吉田茂. 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M]. 孙凡,张文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5—6.
- [10] (日)信夫清三郎. 日本政治史·第一卷[M]. 周启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 [11] 冯天瑜. 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605—611.
- [12] 许介麟. 谁最了解日本[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 [13] 王晓秋. 太平天国革命对日本的影响[J]. 历史研究,1981(2):71—84.
- [14] 黄维民. 略论鸦片战争对近代日本民族觉醒的影响[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77—79.
- [15] 徐平. 近代日本的历史性抉择[J]. 世界历史,1991(5):80—89.
- [16] (日)井上清. 日本历史(中册)[M]. 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校.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504.
- [17] (美)马士,宓亨利. 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册)[M]. 姚曾虞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309.
- [18] (日)中山久四郎. 近代中国对维新前后日本的各种影响[G]. 东京大学史学会. 明治维新史研究. 东京:富山房,1930:433.
- [19] (日)中山久四郎. 近世支那の日本文化に及ぼしたる势力影响[J]. 史学杂志,第26编第2号,1915(2):145.

责任编辑 张颖超

The Internal Disorder and Foreign Invasions of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Start of Japanese Modernization

LUO Li-do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China repeatedly suffered the aggressions of western colonialists and perished gradually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the large-scale peasant uprising erupted. This turned China into the situation of internal disorder and foreign invasions. This situation, however, sent out the intense warning repeatedly to Japan which was closed off at that time from other countries. Japan, with such enlightenment of reforming and defending against the invasion powers, stepped onto the modernization road of opening the country, opposing Tokugawa Shogunate movement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of Japan;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situation of internal disorder and foreign invasions; the opening of the country; Meiji restoration